

# 皖东最早的革命图书室： 播撒红色思想火种



▲长昌祥书店旧址(黄让之在上海读书假期回天长假后在此开办图书室)



▲黄让之

坐落于安徽省天长市北部、高邮湖畔的铜城镇，其老街保留着传统的民居风貌，街巷古朴。在老街之中，坐落着一处重要的红色旧址——黄让之图书室。这里是天长地区最早传播革命思想的阵地，是见证滁州早期革命历程的重要红色地标。百年风雨变迁，旧址依旧静静矗立，默默讲述着皖东首位共产党员黄让之的坚守信仰、以身许国的革命一生。

黄让之(1902—1934)，原名黄舜融，又名黄省之，安徽天长铜城人。他自幼追求进步，早年便订阅《新青年》接受新思想。1923年，黄让之考入有着“东方红色大学”美誉的上海大学，入校当年便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同属中共上海地委第一小组。在校期间，他积极投身革命，和同学开办工人夜校，参与五卅运动，还与恽代英一同负责学生运动工作，在革命熔炉中不断淬炼成长。

▼黄让之故居



1924年夏，黄让之回到家乡天长铜城镇，他带回大批革命书籍，设立图书室，在青年中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后与天长青年陶振誉一同成立进步组织励志会(后改为天旰青年同志会)。励志会积极团结革命青年，传播马列主义思想，为后来天长共青团和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31年冬，天长第一个共青团小组在黄让之的家乡铜城镇秘密成立。1932年，成立天长县共青团支部。

1926年，黄让之随恽代英、邓中夏赴广州参加北伐战争，在邓演达、郭沫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大革命失败后，黄让之和妻子王肇湘在原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组织处处长章伯钧介绍下到北平发展。在北平期间，他牵头组建农工党(即“第三党”)北平市第一个党小组，担任北平市党部负责人之一，以编辑、公职人员身份为掩护，联络知识分子与进步军人，持续开展反蒋革命活动。

1933年，黄让之强忍丧妻之痛、抱病远赴福建，参与策动福建事变，助力反蒋抗日斗争。事变失败后，他遭人告密被捕，经多方营救才得以脱险。1934年，积劳成疾的黄让之最后一次回到故乡铜城，同年10月不幸病逝，年仅32岁。

作为皖东革命思想的起点之一，铜城老街上的图书室记载着黄让之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这位从“红色大学”走出、在家乡播撒火种、为理想奋斗至生命最后一刻的先驱，用短暂一生践行初心。百年岁月流转，图书室早已完成历史使命，但它承载的红色精神却永不褪色。

## 红色地标中的党史故事

编者按

皖东热土红色印记遍布，精神生生不息。每一座红色地标都是生动教材，每一段党史故事都见证初心使命。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为传承红色基因、汲取精神力量，滁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市档案馆)、滁州日报社联合推出《红色地标中的党史故事》专栏，深入挖掘地标背后的党史故事，引导广大党员群众铭记光辉历史、勇担时代使命。

□文字整理:钱宝 任洋洋 □图片来源:滁州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市档案馆)



▲抗大八分校全体教职学员合影

## 天长抗大八分校(九分校)旧址—— 三面锦旗见证军民鱼水之情

地处安徽天长境内的龙岗古镇，自古便是繁华商埠，当地商贸兴盛、文风绵长，古朴街巷留存着岁月沉淀的风貌。在这座底蕴深厚的古镇里，坐落着一处意义非凡的红色旧址——抗大八分校、九分校办学旧址。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淮南抗日根据地重要的革命育人阵地，也是皖东大地见证军民同心、共御外敌的经典红色地标。

抗日战争时期，战火燃遍江淮大地，抗大八分校、九分校先后辗转来到天长龙岗驻扎办学。这支革命队伍近千名学员分散居住在当地百姓家中，纪律严明、作风优良，对群众秋毫无犯。学员们主动清扫居所、打理街巷，校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常年为乡亲们免费问诊看病，理发员也热心为驻地群众服务。长久的朝夕相伴，让学员与房东亲如一家。平日学员向百姓借用针线、剪刀等小物件，即便房门敞开，也始终恪守礼节，绝不踏入百姓卧室，一举一动都让龙岗民众深受触动，革命队伍的优良作风深深烙印在当地人心中。

军民之间真挚的情谊，化作了一面面饱含心意的锦旗。1942年八一建军节，为表达对子弟兵的爱戴与拥护，龙岗各界群众精心筹备庆祝活动。在商民抗敌协会的牵头组织下，工抗、农抗、文抗、青抗、妇抗等众多群众团体联合全镇百姓，共同制作了一面巨型锦旗赠予抗大八分校。这面锦旗选用一丈二尺长的大红花丝葛为旗面，镶着精致黄边，旗面上“越抗越大”四个大字格外醒目，寄托着龙岗人民期盼革命队伍发展壮大、早日驱逐日寇、重建美好家园

的殷切愿望。抗大八分校也以一面题写“铜墙铁壁”的锦旗回赠当地民众，寓意龙岗百姓如同坚固屏障，守护着革命学子安心学习、积蓄力量。

1943年，抗大九分校在苏南遭到国民党顽固派袭击，随后奉命渡江北上，并于当年7月正式在龙岗开展教学工作。当年的八一建军节，龙岗人民又送了面题有“钢筋铁骨”的锦旗给抗大九分校，充分表达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对抗大九校的赞誉和拥戴。随后，军民在胡家大滩举办盛大联欢会，整座

古镇处处欢声笑语，洋溢着团结奋进的欢乐氛围。

斗转星移，当年三面承载着浓浓情意的锦旗早已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但锦旗背后凝结的军民鱼水情，从未被岁月淡忘。龙岗抗大八分校、九分校旧址，承载着抗战岁月的集体记忆，见证着军民同心、共赴国难的革命情怀。时至今日，这座红色地标依旧发挥着育人作用，那段风雨同舟、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以及军民一心、不畏强敌的红色精神，在皖东大地代代传承、历久弥新。



▲天长抗大八分校(九分校)教室旧址

滁 阳 景 深

## 池阳遗韵：梅竹诗魂与定远文脉

□作者:郑鹏程

池河如练，穿镇而过。在定远池河古镇的文脉长卷中，池阳诗社绝非寻常笔墨，它是嵌在池阳锁里的文化丰碑，是江淮大地文脉传承的鲜活见证。而马寿亭先生，则是民国时期这方诗社最耀眼的守灯人。

诗社肇始，远在明代，初名池阳吟社，创始者为戴豪公，名国尊，字子豪。戴豪公于太平桥东戴家院子戴家大院紫轩书屋内结社，以诗词、楹联、书画雅集为趣，开启了古镇文脉的数百年传承。相传“池河无水也可，杯榭无木不行”这副广为流传的对联，便出自戴豪公之手，成为池河地方文化的一段佳话。后来永乐大帝南巡，戴豪公迎犒献联，诗社也随之声名远播，皖东一隅，多了个吟诗作赋的风雅去处。

清光绪八年(1882年)，是池阳诗社有明确纪年与完整诗词记载的开端。此时“池阳吟社”正式定名池阳诗社。这一时期的社长为戴延儒，字裔臣，号子珍，书斋名练川楼，位于原池河铁木业社西南处。戴延儒生于1865年，卒于1920年，光绪丁酉科贡生，曾出任湖南靖州县令，一生著书立说，笔耕不辍，著有《练川楼诗文集》《读报笔记》。彼时的池阳诗社，文脉昌盛，佳作迭传，为定远文化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国年间，池阳诗社迎来一段关键传承

期，由戴吉临担任社长主持社务，诗社活动中心随之迁至马寿亭先生家中的梅竹山房。梅竹山房青瓦灰墙，藏于池河古镇寻常巷陌，却因聚四方贤达而成为民国定远文化的精神高地。当时诗社聚集了戴吉临、马寿亭、方楚琴、鲍胥三等地方名士，与之交游唱和的还有学人周龙光等知名学者，其后张子山、张溶川、米德年、陈鸣皋等本土才俊亦陆续入社。诗社成员众多，无酒肉之喧，唯有清茶一盃，无浮华之语，只有吟哦之声，彼此以文会友，以诗传情，佳作迭出，对池河乃至定远及皖东一带的传承与发展，影响深远。

六百年间，池阳诗社历经朝代更迭、世事变迁，却始终坚守现实主义创作底色，传承爱国爱乡、立德修身的人文情怀。即便在“七七事变”之后，日寇大举侵华，烧杀抢掠不绝，池河危急，山河破碎，诗社同仁被迫四散逃难，奔波流离，但诗词创作从未中断，反而成为抒发家国情怀、慰藉心灵的精神寄托。离散之中，诸位老先生以书信往来，彼此联吟，以诗寄情，文脉未断，风骨未改。

方楚琴曾赠马寿亭一诗：“离家树见六番黄，回首池阳路更长。独在异乡多寂寞，逢君联吟喜犹狂。”寥寥数语，道尽异乡漂泊的孤寂、重逢联吟的欣喜，读来令人动容。马寿亭谨步原

韵回赠：“三秋已过菊犹黄，旅客怀乡愁倍长。愿与我公归故里，同车相伴乐如狂。”一唱一和之间，是挚友间的相知相惜，更是乱世中对故土的深切眷恋。

战火之中，诗人们的家国情怀更显炽热。新四军在津浦路管店一战告捷，重创日寇，消息传至诗友之间，众人振奋不已。方楚琴挥笔写下《津浦路管店一战》，颂扬军民抗敌的英勇无畏：“解放军人勇气高，身经百战不辞劳。暴强日寇闻风败，得胜鼓舞振九霄。”马寿亭亦步原韵连作数首，抒发爱国之心、抗敌之志：“军民爱国热情高，抵抗强权任务劳。堪笑倭奴作幻梦，空将炮弹响重霄。人民觉悟已提高，团结精诚认苦劳。诿到睡狮今醒睡，雄成一吼震九霄。”两首诗皆质朴有力，既抒发对侵略者的愤慨，又彰显民族觉醒的力量，成为池阳诗社爱国精神的鲜明写照。虽身处离乱，池阳诗社的诗友们依旧以诗明志，唱和不绝，胸臆直抒，风骨不改。

池阳诗社的活动场所长期设在马寿亭先生的梅竹山房。马寿亭(1886—1967)，享年八十一岁，幼年在池河读私塾，与周龙光是同窗好友。周龙光学业有成，早年赴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部深造，归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31年底出任天津市市长，1933年6月去职。任天津市市长

期间，周龙光曾念及同窗情谊，力邀马寿亭赴天津任职，马寿亭虽感念友意，却心系故土，不愿远离桑梓，终其一生寄情于诗文书墨之间。

1937年日寇进逼池河，战火逼近家门，马寿亭父母坚守故土，坚决不愿离乡“跑反”，最终不幸遭日机轰炸遇难。国仇家恨集于一身，马寿亭悲痛万分，后迁居三和集镇数年，仍初心不改，坚持开办私塾，启蒙乡童，传授文化知识，同时积极宣传抗日思想，讲述抗敌故事，激励民众奋起抗学，以笔为枪，以教为盾，践行文人的责任与担当。

马寿亭一生才情横溢，精于诗词歌赋，亦擅长沙书画艺术，尤喜梅兰竹菊。其画作笔墨苍劲、线条凝练、力透纸背，所绘梅花傲骨铮铮、竹子挺拔不屈、兰花清雅淡然、菊花傲霜而立，每一幅作品皆蕴含对风骨的坚守与对生活的体悟，至今仍有数幅作品传世，成为定远书画文化的珍贵遗存。他一生治学修身，家教严谨，四子一女皆学有所成，或投身文教，或服务地方，孙辈亦多能立足岗位，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家风传承，泽被后世。

马寿亭逝后，其次子马如珪(1927—2010)，享年八十六岁，自幼受父亲熏陶，热爱诗文，毕生致力于搜集、誊抄、整理父亲散佚的诗词手稿，其本人书法亦佳，笔锋稳健，墨韵醇厚。可

惜在六十年代中期，大量手稿佚散，残存文稿寥寥无几。马如珪并未因此放弃，反而踏上漫漫搜集之路，多方走访乡邻、查阅典籍，辗转多地寻觅残篇，逐字逐句誊抄校对，终于在1986年将残存诗文装订成册，取名《三史联吟》，收录马寿亭与戴吉临、方楚琴等人的唱和之作，完整保留了那段乱世文脉的珍贵记忆。此册现由马如珪长子马元国精心收藏，正拟付梓出版，堪称定远地方传统文化的一件珍贵瑰宝。

回望六百年风雨流转，池阳诗社自明代紫轩书屋肇兴，经清代练川楼承续，再由民国戴吉临主持、马寿亭鼎力守护，一脉相承，从未中断。它不仅是池河古镇的文化标志，更是定远历史上一段真实可感、有诗、有人、有风骨的文化记忆，承载着皖东文人的坚守与情怀。

岁月流转，太平桥依旧静立，青石板上的足迹虽已淡去，却仍诉说着古镇的过往；池阳诗社的旧址虽已难觅原貌，梅竹山房的余韵、《三史联吟》的墨香，却绕着池河的流水，绵延不绝。马寿亭先生以一生坚守，让诗社在乱世中不坠风骨，让家国情怀融入笔墨；戴吉临社长以热忱担当，承续文脉薪火。池阳诗社的精神，早已融入定远的文化血脉，成为一方水土最温润、也最坚实的精神底色，在时光流转中，继续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文脉与精神。